

# 区域规划思想之形成及其在西方的早期实践与影响\*

刘亦师

The Formulation of Regional Planning Idea and Its Early Practices and Impacts in the West

LIU Yishi

**Abstract:**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s a period of drastic political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s. In this context, the formulation of the regional planning idea is not only a symbol of the maturity of modern city planning but also a reflec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and socio-economic thoughts at the time. The Garden City concept proposed by Ebenezer Howard had included the idea of region and regional planning, and early planners such as Patrick Geddes, Raymond Unwin, Patrick Abercrombie, Thomas Adams, Clarence Stein, Benton Mackaye, and Lewis Mumford amongst others, also extolled or practiced regional planning. Covering three time periods between 1900 and 1945 characterized by different sociopolitical changes, this paper traces the trajectory of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planning in the West, particularly the UK and the US. It argues that social reform ideas and practices such as Municipal Socialism in the UK and Progressivism in the US underpin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planning in these two countries later on, which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to a British-American planning tradition distinct from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In the meantime, British planners and their American counterparts followed different paths of theorizing and practicing regional planning and complemented each other, which was epitomized in the 1944 Greater London Plan.

**Keywords:** regional planning; social reform; urban decentralization; Reg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America; Greater London Plan

**提要** 20世纪上半叶是全球政治格局剧烈变动的时期。在这种全球变局的大背景下,区域规划思想的形成及其实践不仅是现代城市规划学科逐渐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折射出西方政治、经济思想的演替。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已包含了区域规划观念,而早期英、美两国重要的规划家如格底思、恩翁、阿伯克隆比、亚当斯、斯泰恩、麦凯、芒福德等相率参与了区域规划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工作。根据西方政治、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其对城市规划的影响,将20世纪上半叶划分为3个时间段,分别考察区域规划思想在西方尤其是英美两国的发展演进及其补充、完善等历史过程,指出19世纪中后叶英、美兴起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浪潮如“市政社会主义”和进步主义思想,是形成英美规划传统并导致区域规划在两国发展的根本原因,也使之领先于欧洲大陆国家。同时,美、英两国的区域规划发展各循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不同路径,但相互借鉴补充,在思想、方法、制度和教育基础等诸方面为区域规划在二战后大行其道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区域规划; 社会变革; 城市疏散; 美国区域规划协会; 大伦敦规划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6361/j.upf.202106014

文章编号 1000-3363(2021)06-0109-09

## 1 从城市规划到区域规划:一种规划观念之产生与普及

区域规划“从发展历史上看,主要是在城市规划的基础上扩大范围而开展起来的”(胡序威,1982)。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有无本质区别呢?是否将主要针对城市的“城市规划”的规划原则和技术方法扩大到一定范围,就是区域规划?抑或区域规划所需考虑的不止是大城市本身,而是兼顾广大区域内的次级城镇和农村腹地的发展情形,从而形成新的规划愿景与原则?

究其本质而言,作为区域层面的空间发展计划与行动,区域规划已不局限于物质空间布局的范畴,而成为政策手段的继续,即“实现一定地区范围的开发和建设目标而进行的总体部署”,是介乎全国性经济规划和城市规划之间的规划层级而为后者发展提供

\*本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机构史视角下的北京现代建筑历史研究”(项目编号:51778318)资助

### 作者简介

刘亦师,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博导,  
liuyishi@tsinghua.edu.cn

了依据。因为区域规划牵涉较多学科,对其认识也不尽相同,或将其作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胡序威,2019),或视作经济地理学的有益补充(张之,等,1960),或将之理解为“是国家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武廷海,2019)。城市规划学界比较统一的看法,区域规划是在较大地域范围上对社会、经济、科技等各方面发展进行综合分析后所作的总体战略部署(吴万齐,1983;崔功豪,2010;吴超,等,2003)。无论哪种定义,都突出了区域规划工作的综合性及其战略意义,“是合理地分布各地区生产力的重要方法,是一个地区范围内整个经济建设的战略布局,是国民经济计划的具体化”(张之,等,1960)。

事实上,区域规划的观念产生很早,其重要性也很快为人们所认识。20世纪初的规划学家很早就认识到有必要在包含了若干个地方个政府的区域内对其发展进行综合统筹的规划(Abercrombie P, 1926)。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才真正开始实施区域规划。法国区域规划的开展甚至很晚,到1960年代才制定出第一版巴黎及其周边的区域规划(Wendeln M, 2011)。可见,区域规划思想自其萌生到被议会民主制国家接受而普遍施行,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全面实行土地公有,早在1919年就开始推行区域规划,其区域规划理论和方法后来为包括我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所习仿(张之,等,1960);德国、日本在1930年代也曾相率模仿苏联的“五年计划”模式和区域规划方法,对该国的经济资源进行统筹布局,继之进行各地城市建设。

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自由主义传统影响深远的国家,区域规划的发展较为迟缓呢?第一,西方各国普遍实行的土地私有制是区域规划发展的最大阻碍之一。19世纪欧美各国政治思想家和经济学家对土地私有制的质疑、批判并提出过各种土地公有化方案,但遭到地主阶层的极力阻挠。而城市规划能否有效施行的核心,就是如何获取处置土地及因地价增值所致的经济利益的合法权力。1909年以后英国城市规划的缓慢发展很大程度上正是由土地权属分

散造成的。因此,牵涉面更广、利益纠葛更加复杂的区域规划更加难以推进。

第二,在行政区划和权属方面,地方政府负责各自规划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并对相应区域征税,例如1930年代英国各地方政府中负责城市规划的部门多达1400多个(Cullingworth, B, 等, 2015),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其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更导致跨越行政边界的区域规划活动难以实行。即使如1920年代的英国那样因产业协同发展等原因成立了跨行政区的委员会,也因在缺少直属中央的权威机构而多流于形式,无法见诸实效。

第三,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主导欧美国家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思想逐渐开始遭到质疑,社会舆论和意识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19世纪末发源于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progressivism)要求政府摒弃此前自由放任政策,打击垄断资本、加强对经济干预,并担负起提供廉租房、养老金、义务教育等社会福利的责任。进步主义改革运动牵涉极广,举凡地稅改革、平民住房改革、女性平权运动、专家委员会制度之出现及至传教政策迁变等,均与之密切相关,后文提及的美国规划家都成长于这一时期且深受进步主义思想的感染。而在大洋彼岸的英国在1870年代也提出了由国营公司提供燃气、供水为主要内容的“市政社会主义”(municipal socialism),进而由英国议会立法推行各种改革,包括逐步扩大政府对土地征收和统一开发的权力,历经大半个世纪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区域规划的实施奠定了基础。但是,从一种思想提出到转为最终的政策存在需要漫长的历史过程,区域规划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且深刻影响了政府的组织形式和经济政策。

区域规划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早期的重要规划学家如格迪斯、阿伯克隆比等已就其本质和方法进行过系统论述(Geddes P, 1915; Abercrombie P, 1923),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研究成果也很多(Hall P, 2010; 彼得·霍尔, 2008; 吴志强, 2008)。但是,既有中外文献大多以区域规划在某地、某一时段的发展或某些实践为研究对象,罕少从全球视角勾勒这一规划思想发展的轨迹。目前区域规划研究最权威的著作是霍尔

(Peter Hall)出版于1975年的《城市和区域规划》,此书曾累经再版和翻译,但如作者所言其书“以英国的观点来撰写,为英国的读者服务”(彼得·霍尔, 2008),主要论述的是1945年以后的情况,对区域规划初创时期的发展描绘过简。并且,在这种“英国中心主义”的视角下,该书几乎没有提及美国在区域规划发展中的贡献。而美国区域规划史家斯潘(Edward Spann)关于美国城市规划协会的著作则以其成员为对象,又很少涉及大西洋彼岸区域规划的相关进展(Spann E, 1996)。国内系统梳理西方区域规划思想起源和发展的相关成果则更少。

因此,本文依据区域规划发展的3个历史阶段——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18年为初生阶段、1919年至1933年为其在欧洲遭遇重重困难但在美国取得较大进展、1933年至1945年在大西洋两岸均蓬勃发展时期,在20世纪上半叶全球变局中追溯区域规划思想形成、充实及其实践与制度化的发展过程,呈现较完整的历史图景。在此过程中,区域规划思想不断发展和丰富其自身,挣脱了物质规划的羁绊而成为推动社会改革和推行新政策的重要工具和载体,从而改变了欧美各国的城市空间和生活方式,形成新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意识形态。因此,本文亦拟考察其如何进入公众视野并成为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终致大大扩张“规划”的边界和涵义,更进而改变了欧美各国的空间形态以至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体现出区域规划由社会改革所驱动且与国家政策紧密联系的重要特征。

## 2 区域规划思想之兴起及其困境: 19世纪末至1918年

现代城市规划在其酝酿时期就包含了区域规划思想,这也是现代城市规划区别于19世纪及其之前各种理想城市方案的重要特征之一。

1882年,志在推动社会改革的西班牙火车工程师索里亚(Arturo Soria y Mata, 1844—1920)提出了带形城市思想(Linear City),并于1892年开始在马德里郊外购并土地、逐步实施。带形城市思想依赖当时逐渐发展成熟的轨道交通

技术,提出以疏散人口和产业的方法解决过度拥挤、污染严重等城市问题,进而实现社会改良。有关带形城市思想国内外研究较多,惟应注意带形城市思想同样也强调城市扩张与其周边腹地的协同发展,“在主街两侧有序地建造住宅和城市的各类设施,并在外围布置工业,实现人口和产业的转移”,而工业区外围则是禁止开发的农田和郊外公园,从而实现索里亚提出的“乡村城市化;城市乡村化”目标。但是,在较长时间内,带形城市思想的实践和传播仅限于马德里和拉美国家,影响远不如之后兴起的田园城市运动(刘亦师,2020)。

1898年,英国人霍华德出版《明日——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在书中提出著名的田园城市思想,详细描绘出一种人口规模有限(最多32000人)、其城区由绿地或农田限定、兼顾工农业发展的新型城市。霍华德的真实意图,是在一个广大区域内相隔一定距离重复建设这种“田园城市”,促成区域中心城市(“母城”)的消解并围绕其形成“社会城市群”(social cities),我国近代亦译作“复合田园都市”。通过这种方式,得以将现有大城市的冗余人口和工业疏散到其周边自给自足的“新城”中,其相互间通过便捷的水陆交通彼此连接为一有机体,而在较大空间范围中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最终以渐进、和平的方式重塑英国的城乡空间结构。在田园城市思想影响下,英国的早期规划家以伦敦为对象提出过一些立足于区域解决城市问题的方案,但尚缺少坚实的规划依据和可行的技术手段(图1)。

可见,着眼于区域及区域内协调发展是田园城市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最终目的。但是,随着田园城市运动的开展,住宅区规划、道路形式、景观朝向等物质空间的内容日渐成为这场运动关注的焦点(Unwin R, 2014),但霍华德最初的社会改革目标则被搁置不问,其区域规划的宏图也无从谈起。

除英国外,20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主要欧洲城市如巴黎、柏林、维也纳、罗马等以其城市整体局部地区为对象,都曾举办过规划竞赛,获奖方案虽力图贯彻田园城市思想关于绿化隔离带和区域交通网络等主张,但重点仍集中在城市

设计上(Ökesli D, 2009)。这些以“区域规划”为名的规划方案,均着眼于城市空间形态及郊区与城区的关系,其空间范围不过市区及其近郊而已,也未涉及产业和经济布局等内容,仍未脱城市规划的窠臼。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区域规划的实践很少,并未形成大的影响,其观念普及尚待时日。

相比之下,美国的区域规划发展迅速得多。英国规划家阿伯克隆比曾在1920年代初撰文介绍美国区域规划的进展(Abercrombie P, 1923),批评欧洲区域规划的误区与发展迟缓,并指出1880年代的美国波士顿及其周边的园林路规划是最早、最成功的案例,其规划观念和管理经验深值借鉴。园林路(parkway)是美国景观学之父奥姆斯泰德(Frederick Olmsted)提出的构想,用以连接城市内外的不同公园。1886年,奥姆斯泰德受聘主持波士顿地区的公园及园林路规划工作。在对目标区域详细调查后,奥姆斯泰德说服波士顿及周边县市联合成立了联合委员会<sup>①</sup>,负责协调跨行政区的工程进展和利益协调工作,并集资统一征购土地,再盱衡全局布置公园、保护湿地和进行道路建设(Dalbey M, 2002),其范围涉及波士顿周边共38个地方政府的行政区划,面积广达15000英亩,几乎涵盖波士顿地区沿岸全境,也证明了“联合行动并共同承担经济上的责任”是开展区域规划的可行方式(Abercrombie P, 1923)(图2)。

除了设计方法和工程建设上的成就外,该例对区域规划的管理方式和规划观念的扩展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波士顿区域园林路规划考虑了波士顿周边各地的特征,在道路布局上结合城市发展的趋势,不止步于向市民提供休闲娱乐空间,而是依托新建的道路网,争取在波士顿周围各县市都创造繁荣就业的机会,在波士顿以外努力造成人口和产业繁盛的次级中心。这与以波士顿为中心向周边地区扩展其郊外住宅区的“蔓延”方式截然不同,而是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联合多个地方政府逐步推动区域规划的实施。并且,波士顿区域园林路规划与建设的经验,已得到大洋彼岸英国规划师和建筑师的关注,如利物浦在1910年代已开始建设连接城区与郊区的公园



图1 英国规划家 Arthur Crow 做围绕伦敦的区域规划方案, 1910年

Fig. 1 Ten health cities around London by Arthur Crow in 1910

资料来源: The RIBA, 19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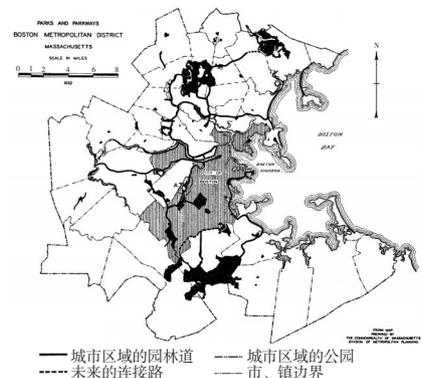


图2 波士顿及其周边区域的公园绿地与道路系统

Fig. 2 Parks and parkways in Boston and its environ in the 1890s

资料来源: NOLEN J, 等, 1937.

路系统;阿伯克隆比也认识到“多个中心的协同发展远比一个中心城市主导一切要好得多”(Van Roosmalen P, 1997),这一观念也成为贯穿他此后规划生涯的基本原则。

### 3 区域规划观念与方法之发展及其早期实践(1919—1933年)

#### 3.1 欧洲的区域规划发展

190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有关城市规划的法案——《住房、城市规划等法案》(The Housing, Town Planning, etc. Act)。这部法案是现代城市规划学科成立的重要标志之一,但规划史家多认为其目标和范围过于狭隘,针对的是英国城市郊区新建居住区的空间布局,条文也失之约束力,因此成效不彰(Sause G, 1952)。1919年,英国通过了第二部城市规划法,相比10年前的法案,以强制性条文规定在2万人以上的城镇凡新建的居住区必须事先制定

规划方案。但究其本质，这两个法案“不过是针对城市郊区的规划法案”（Ab-ercrombie P, 1923），其空间范围主要针对开发区域。不同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政府为兑现战争期间所做“为复原老兵提供体面住房”（home fit for heroes）的承诺，在1919年的规划法案中也将整治和重建城市中拥挤不堪的旧城区列入规划对象，使贫民窟地区的清除和改造成为当务之急。

为了推进这一工作，英国议会委任刚当选议员的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 1869—1940）<sup>②</sup>主持“非健康地区调查委员会”（Unhealthy Area Committee），研究旧城区现状及其改进方式，并就新的居住模式和住宅方案提出建议。张伯伦曾担任伯明翰市长，一直积极推动1909年英国规划法案的实施（刘亦师，2021）。张伯伦委员会在其1921年的最终报告中明确提出将居民和部分产业向伦敦城区以外进行疏散，并建议以田园城市式的卫星城和独栋住宅容纳这些外迁人口，成为英国规划史上最早提出将伦敦人口向周边区域有序疏散的官方文件（Cherry G, 1980）。1920年代以降关于伦敦的历次规划都参考了这份报告的结论，影响巨大而深远。

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张伯伦长期主政英国卫生部（当时英国城市规划工作归属该部管理），以致力于疏散伦敦人口闻名。1927年，张伯伦组建了大伦敦区域规划委员会（Greater London Regional Planning Committee），并聘任英国当时最著名的规划家、田园城市运动的主将恩翁（Raymond Unwin）为总规划师，负责研究和制定伦敦及其周边地区的总体规划。恩翁提出伦敦的周边地带应作为禁止开发的绿地或农田处理，新建和扩建的“卫星城”则应散落在这些绿地中，而绝不应连片发展（Oliveira F, 2017）。恩翁于1929年和1933年分别提出了两轮规划方案，均以构成环绕伦敦建城区的绿地空间为主要目标，进而提出了“绿化隔离带”（green girdle）的概念，在建成区和郊区外围形成环状的绿地系统（图3）。恩翁的这些规划正处于全球性经济危机愈演愈烈期间，难以实施，但其绿化隔离带的形态则发生了长久的影响。

此外，张伯伦于1937年当选英国首

相，旋即委任著名的巴罗委员会（Barlow Commission）从事全国性工业布局和伦敦疏散问题的研究，“体现其政治家的卓见”（Ward S, 2004）。张伯伦此后在外交上推行“绥靖政策”而广遭诟病，但其对英国城市规划发展的某些重要贡献不应被忽视。

欧洲其他国家在区域规划方面的进展同样迟缓。魏玛德国曾授权各邦在其行政区划内制定相应的区域规划。1920年普鲁士邦鲁尔煤矿区成立鲁尔定居点协会（Siedlungsverband Ruhrkohlenbezirk），于1927年制定了跨越多个地方政府的行政界限统一布局城镇发展规划，可视为欧洲大陆较早的区域规划实践（Pahl-Weber E, 2008）。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欧洲各国区域规划的发展相对迟缓，区域规划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也没有真正成为中央政府的政策工具。

### 3.2 麦凯及其阿拉巴契亚山脉区域规划方案的提出与实施

阿拉巴契亚山脉（The Appalachian Mountains）是纵贯北美洲东部的巨大山系，也是这一区域诸多山脉的总称。随着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日渐富庶，各州对其境内的山区都进行了一定开发（Dalbey M, 2002），但这些工作尚未统合起来。1921年，曾在美国林业部任职的美国林学家麦凯（Benton Mackaye, 1879—1975）经过多年的实地考察和思考，在《美国建筑师学会会刊》上发表题为“阿拉巴契亚山道：一个区域规划项目”的文章（Mackaye B, 1921），提出著名的“阿拉巴契亚山道”（The Appalachian Trail）方案（图4），并率先阐明了区域规划实践的重要意义。这一论文篇幅不长，但一经发表即引起规划界和政界的广泛关注，是美国城市规划发展的里程碑式事件。

在1921年的文章中，麦凯提出了不同于以大城市为核心、向周边农村区域建设公路体系，使大城市向其腹地蔓延导致彻底破坏原先小城镇生产方式和空间肌理。麦凯以人民渴求的休闲娱乐为切入口，要求各州按其自然资源的情况对阿拉巴契亚山区加以适度开发，坚持在山区统一采取供人徒步行走的道路（trailway）以切实保护山区的自然风景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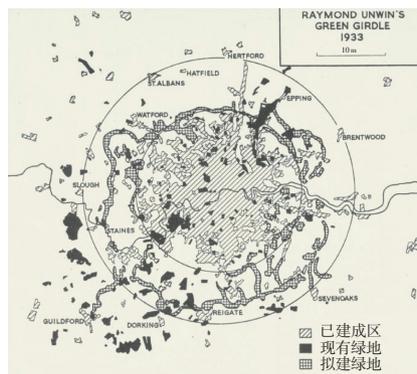


图3 恩翁的第一版伦敦区域规划方案，1929年

Fig. 3 R. Unwin's first regional plan for London in 1929

资料来源：Thomas D, 19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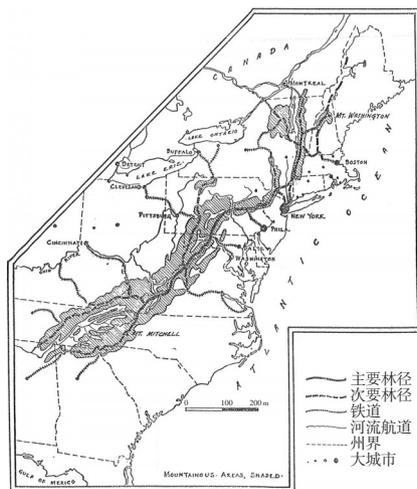


图4 麦凯绘制的阿拉巴契亚山道区域规划图，1921年

Fig. 4 Planning scheme for Appalachian Mountains in 1921

资料来源：Mackaye, 1921

提倡有别于汽车旅行的新休闲方式——山区徒步旅行。同时，他提出每隔一定距离建设设施相对完善的山区小镇和营地。以此为契机，可带来相应旅游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使部分城市人口转移到这些地区，并促成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实现麦凯所谓的“再城市化”（re-centralization）。

麦凯坚决反对通过规划等政策手段进一步强化现有大城市的统治地位，使区域的发展完全顺从大城市工业和商业发展的需求，认为应根据格迪斯的调查方法，充分凸显各个地方的空间特征和生产优势。通过对阿拉巴契亚山道的规划和建设，促成休闲娱乐相关的产业和劳动力的重新布局，使美国东部地区形

成与自然紧密联系、城市群分布合理、经济发展逐步平衡的发展。这与1890年代波士顿公园路系统的规划思想大相径庭，也完全不同于当时欧美各国正在发生的城市蔓延现象。

在麦凯等人的推动下，1925年3月规划家、自然保护活动者和政府官员等在华盛顿召开了第一次“阿拉巴契亚山道会议”（Appalachian Trail Conference）。这一会议后来定期举办，并演变为阿拉巴契亚山道保护组织（Appalachian Trail Conservancy），是促成美国各州开展这一区域自然保护和开发建设的重要的非官方机构，其与美国国家公园系统（National Park System）和交通部等部门合作，最终完成了延绵超过3200km的山道及其周边基础设施的建设（Dalbey M., 2002）（图5）。参与筹办1925年会议的重要人物包括后来曾相继担任美国总统的胡佛（John Edgar Hoover, 1895—1972）和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882—1945），后者在其纽约州长任内曾聘请麦凯为该州的规划顾问（Anderson L., 2002）。

麦凯一贯主张将区域规划作为从总体上部署城市化和发展区域经济的方式，进而藉此重塑美国的城市空间结构并推动更全面的社会改革，因此赋予了区域规划新的功能和目的。

### 3.3 美国区域规划协会及其理论发展

1921年麦凯移居纽约，与芒福德（Lewis Mumford, 1895—1990）和建筑师如斯泰恩（Clarence Stein, 1882—1975）和莱特（Henry Wright, 1878—1936）等成长于进步主义时代中的纽约左倾知识分子相熟稔。虽然当时美国城市已在进行各项局部改革，但他们认为亟待创造出一种可以统御全局的方式来推动全面改革。

1923年3月，在斯泰恩的组织下，这批人宣告成立新组织——“美国区域规划协会”（Reg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America）以推动区域规划理论创造和实践。由于斯泰恩、麦凯、芒福德等人均深受田园城市思想和田园城市运动的影响，该组织的名称中原拟作“美国田园城市与区域规划协会”，旋为体现当时最为关切的问题而改用“美国区域

规划协会”，但田园城市学说及其区域规划思想仍是该组织的重要理论参考（Schaffer D., 1992）。

该协会以纽约为活动中心，是独立于官方机构之外、组织松散的民间学术组织（Anderson L., 2002）。其成员主张以区域规划为手段推动社会改革，即改变当前城市规划的通常做法：扩大城区范围、强化城市在区域中的地位，以及屈从于资本和利润需求等方式，改为在更广大的区域中，将城市产业和人口分散到原先已衰败的小城镇中，阻遏人口向大城市的单向流动，同时复兴此前破落的中小城市——这也是对麦凯在1921年提出的方案的深化。在此过程中，美国区域规划协会的成员特别重视如何彰显地方特色并延续其特殊的人地关系，力图使区域内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各安其所，能均享规划带来的利益。

### 3.4 纽约市区域规划的实践与反思

纽约市是1920年代美国区域规划研究的中心。除上述美国区域规划协会外，同时期在纽约还有另一批规划家也在做系统调研，但采用了不同于前者的立场和方法，试图制定出指导纽约市及其周边区域较长期发展的规划方案。

19世纪后半叶纽约即稳居于美国最大、最繁荣的工业城市，并且由于近郊铁路和市郊轻轨的铺设，使市区范围从原先的曼哈顿岛一隅不断向外扩张，促生出兼跨新泽西州和康涅狄格州的广大城市区域。同时，外国移民在这一时期大批迁入更加速了人口膨胀，从1850年的百余万人猛增至1900年的5百余万人，到1920年代初又增至890万人。

1900年之后，为了应对纽约的住宅短缺和人口拥挤问题，纽约州、纽约市及其所辖区等各级政府制定过不少规划方案，但效果甚微。例如，1920年新成立的纽约港务局（Port of New York Authority）相较之前各自为政的状况虽然已握有很大职权，但主要负责纽约港及市区建设，但未开展全面细致的调研，因此无法从更宏观的区域角度协调现有资源（Johnson D., 2015）。

在此情形下，由私人基金会赞助，纽约上层社会名流组成了非官方的专门委员会，首先对纽约区域开展系统调研。委



图5 波士顿附近之阿拉巴契亚山道一段，2021年

Fig. 5 A section of the Appalachian Trail, photo in 2021

资料来源：徐林提供。

员会征募了当时美国国内最优秀的一批规划家，并聘用田园城市运动的核心人物恩翁（Raymond Unwin）和亚当斯（Thomas Adams, 1871—1940）作为顾问，后者更在1923年初被正式聘任为规划委员会主席，负责统合纽约周边区域的调研结果并制定具体方案（Johnson D., 2015）。

亚当斯团队对以曼哈顿岛为中心、约64.37km（40英里）为半径的广大区域进行了统筹规划。首先，对纽约市及周边的现有交通体系进行梳理，提出以环线和放射路结合的公路网结构，并与铁路和轻轨系统进行整合，尽量扩大运力，逐步促使市区人口和工业向公路沿线转移（图6）。同时，亚当斯特别注意休闲娱乐与公路体系的结合，通过征购土地、造成连片的森林保留地，结合交通网络，首次将原本分散的绿地组成了以指向市区的楔形绿地系统，构成了今天纽约市郊的生态景观基础（Johnson D., 2015）。

但是，亚当斯虽然采用了理性、科学的城市规划方法，但其现实主义态度“使他不得不屈从于金融家和资本家的要求”，致力于布局区域内的空间和基础设施以提高生产效率，满足商业发展和资本攫利的最终目的。美国区域规划协会成员芒福德和麦凯对纽约市区域规划的批评尤为激烈。实际上，他们和亚当斯一样，都接受田园城市思想和格迪斯方法论的影响并认同“疏散”的观点，在交通、绿地系统和居住区设计等技术方面的立场也很近似。但是，在区域规划的目标上，芒福德等人与亚当斯产生了重大分歧。前者认为区域规划应该以“再城市化”的手段消解大城市并形成一系列中心城镇，并在一个广大范围重新布局城市空间，进而改造生产和生活方

式，形成新的社会秩序。他们从根本上质疑将2000万人口作为预设目标的合理性，批评亚当斯的规划强化了纽约市在区域中一家独大的地位，其设计思想“背离了真正的区域规划”而不过是城市规划在更大范围内的一种应用 (Spann E, 1996)；而其设计方法上又过于保守，以提高效率为宗旨的总体规划服务于资本需求，势必导致城区蔓延并使既有的城市问题扩布到整个区域里 (Dalbey M, 2002)。

《纽约市及其周边区域规划》的成果最终在1929年印行出版，得到联邦政府和纽约州政府的认可。同时，由于其在制定过程中就引起美国各届的广泛关注，为普及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的观念及功用做了有效宣传。亚当斯等人此后分别参与创办了哈佛大学、MIT、哥伦比亚大学等规划系 (Johnson D, 2015)，成为开创和推动美国规划教育发展的里程碑。

#### 4 区域规划观念之普及与实施 (1933—1945年)

##### 4.1 美国“新经济政策”及其区域规划实践

无论是美国区域规划协会还是亚当斯，他们都是在美国经济蒸腾发展的1920年代，以独立于官方机构之外的方式开展关于区域规划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这些工作稍后得到政治家的注意，在1930年代初经济危机愈演愈烈时，这些政策决定者开始考虑如何将区域规划作为振兴经济的政策工具加以利用。

1929年罗斯福当选纽约州长后，曾约请斯泰恩商谈纽约市城市人口的疏散和农业振兴等问题，表达了区域规划乃至国家规划是救济现状的重要方法。1933年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决定采取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提出扩大公共工程开支、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等政府干预市场和经济的新政策，试图以之为手段实现充分失业和复兴经济。罗斯福将这些措施统称为“新政” (New Deal)，其得名亦来自美国区域规划协会成员的时论文章 (Spann E, 1993)。

1933年初，罗斯福甫就任总统即签字通过了此前屡遭否决的《田纳西河流域法》 (The TVA Act)，以中央政府授权

形式注资组建田纳西流域管理局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下称“田管局”)，对全流域的水力资源进行调研，确定修筑大坝的位置，以充分利用河道并进行水力发电，继之在区域内因地制宜地发展农、工、林等各产业，“凡农、工、矿、电、交通、卫生以及社会事业皆有兴办，……所发生的电力除供工矿城市需用外，并电化农村，促成了农村的繁荣，同时并大量制造化肥，农产因此增加，在战时这些肥料厂又可改为炸药工厂，兼得国防的便利” (杨达, 1946)。田纳西流域的综合开发不但成为罗斯福“新政”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区域规划实践 (Creese W, 1990) (图7)

作为空间规划的第一步，是为因修筑大坝迁徙的居民提供新的居民点。田管局委任了美国区域规划协会的成员奥格 (Tracy Augur) 为规划师，在1933年底设计了区域内的第一处“新城”——能容纳2000工人的诺里斯镇 (Norris) ③，采取了绿化带和人车分流等规划方法 (图8)。诺里斯镇在1934年即告建成，其规划经验也被作为模范城镇在“新城”建设中推广，成为该区域规划早期的标志性成就。

1933年开始的这些建设和理论构想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规划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中国在美国学习建筑和规划的留学生均“千方百计争取去TVA”参观 (吴良镛, 2016) (图9)。国民政府在抗战前后曾多次派员考察田管局的建设情况，俾为中国近代的区域开发和建设所参考。美国区域规划实践的技术专家，如参与纽约市区域规划的古德里奇和参与田纳西流域规划的萨凡奇 (John Savage, 1879—1967) 都曾受聘于国民政府，分别在南京“首都计划”和长江流域规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4.2 欧洲区域规划思想的理论发展及其实践

1930年代，美国在区域规划方面取得的成就远迈其他各国，“为在世界范围内普及新的规划技术以确保世界和平提供了范例” (Geddes A, 1938)，也在恢复经济活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欧洲列强因此纷纷仿效，尤其阿伯克隆比主



图6 纽约市区域高速公路网结构 (环状路+放射路) 示意图, 1928年  
Fig. 6 Structure of highway system for New York city of the 1928 scheme  
资料来源: The Staff, 19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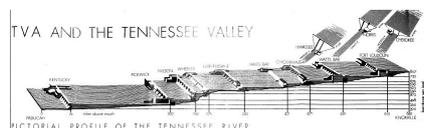


图7 田纳西全流域水力资源调研及筑坝方案示意图, 1933年  
Fig. 7 Map showing investigation of hydraulic resources along the entire Tennessee River  
资料来源: Houston S, 1942.

持制定的两次伦敦规划再次使英国的区域规划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也为二战之后各国战后重建、区域发展和新城规划指示出方向，英国区域规划思想和实践的影响力超过美国 (Hall P, 1989)。这方面文献研究成果颇多 (Hall P, 2010)，本节仅简述这一时期英国区域规划方面思想和方法的创造及其影响。

与美国主要由民间发起的方式不同，英国的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实践与各级政府的策动和引导密不可分。英国自17世纪末“光荣革命”以来形成了特征鲜明的政治传统，即以议会斗争和立法程序促进政治和社会改革 (钱乘旦, 2006)。此外，在英国的传统政治框架下，针对争论很大的社会问题，议会惯常委任多方面专业人才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如前述1919年成立的张伯伦委员会即为典型。这些专门委员会并非为解决具体问题，而是收集大量相关事实并加以分析，成为此后制定政策的依据。为了系统研究伦敦人口和产业过度集中对国家安全和长期发展带来的问题以及如



图8 诺里斯镇总平面图, 1934年

Fig. 8 General plan of Norris Town in 1934

资料来源: Gray A, 等, 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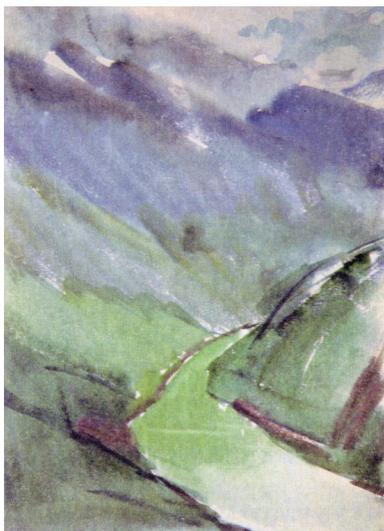


图9 经治理后的田纳西河水彩写生, 吴良镛绘, 1950年

Fig. 9 Watercolor sketch of the Tennessee Valley by WU Liangyong in 1950

资料来源: 吴良镛, 2016.

何从法制上解决这些问题, 英国议会从1937年开始委任了一系列委员会<sup>④</sup>。这些调查和政策研究是由最高权力部门——英国议会直接发起的, 且能直接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施行。通过顶层制度设计不但使之前徘徊不前的区域规划有了长足进步, 同时更一举扩大到英国的全国规划层面。这种自上而下的路径, 无论是制度建构还是法律程序均对世界各国具有借鉴意义。

1937年, 曾长期主政卫生部和英国规划工作、且一向主张疏散伦敦人口的张伯伦当选英国首相, 旋即任命了著名的巴罗委员会, 阿伯克隆比也是该委员会成员之一, 旨在从全国工业布局和经济平衡发展的角度研究伦敦的城市疏散问题。1940年正式公布的《巴罗报告》(Barlow Report) 雄辩地论证了人口和产业过度集中造成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等弊端。1940年伦敦遭到德国轰炸, 迫使伦敦当局加速疏散, 也证实了《巴罗报告》的结论。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 英国国内达成了高度共识, 即国家利益应当凌驾于地方和资本利益之上, 伦敦的产业格局和就业数量也应服从国家需求。同时, 英国民众普遍认同各级规划的重要性, 对声名显赫的规划师如阿伯克隆比等人寄以厚望。在此背景下, 英国于1943年成立城乡规划部 (Ministry of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负责统筹和监督英国各级规划的制定和执行 (Ward S, 2004)。这为战后英国的城市规划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1941年, 负责伦敦市区规划和建设的伦敦郡议会 (London County Council) 委托其总建筑师福肖 (J.H.Forshaw) 和阿伯克隆比共同制定伦敦的战后复建规划, 这就是1943年7月公布的“伦敦郡议会规划” (LCC Plan), 但其主要针对的是伦敦建成区 (图10)。为具体布局外迁的人口和产业, 新建立的城乡规划部于1943年委托阿伯克隆比继续对包括更大范围的伦敦市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划, 此即1944年公布的“大伦敦规划” (Greater London Plan) (图11)。

将1943年和1944年的这两版规划结合在一起考察, 可看到英国区域规划重大、快速的进展。二者都由历来赞成田园城市思想和城市疏散的阿伯克隆比主持, 其规划依据除直接参考《巴罗报告》外, 也遵照1921年张伯伦委员会报告的提议, 从伦敦建成区疏散60余万人、从其周边地带再外迁40万人, 并将之安置在伦敦远郊的若干“新城”中, 其具体设计则遵照田园城市思想的重要原则<sup>⑤</sup>。1944年确定的这一规划成为战后伦敦地区发展的纲领。同时, 在这两处规划中, 阿伯克隆比都采用了著名的圈层空间结构, 并在美国邻里单位设计方法的基础上



图10 1943年伦敦规划发布会, 1943年, 正面左一为阿伯克隆比

Fig. 10 The media release for the 1943 LCC Plan

资料来源: Van Roosmalen P, 1997.

加以创造, 从区域到城市和社区都分割为相互独立、自成系统的若干“片段”, 成为形成空间秩序的重要手段 (图12)。同时, 阿伯克隆比制定了“环状+放射路”的道路结构, 并将道路体系其与楔形绿地有机结合。这两轮规划的共同目标是实施并扩大恩翁在1933年提出的绿化隔离带, 使伦敦地区每千人绿地占有率从1943年以前的不足3英亩 (约1.21hm<sup>2</sup>) 跃升至7—10英亩 (约2.83—4.05hm<sup>2</sup>)。芒福德曾称赞1944年大伦敦规划为“从霍华德之后真正体现的区域规划方案” (Van Roosmalen P, 1997)。

阿伯克隆比的这两个规划方案建立在数十年详尽的调研基础上, 具有清晰的层级体系和空间结构, 在不同尺度上的设计手法简明易学。其指导思想、布局模式以至规划方法, 对二战之后各国规划制度建设和城市规划发展有深刻的影响, 阿伯克隆比的这一套规划思想和设计方法也传播到世界各地, 同时区域规划的重要性也成为各国规划家的共识。以我国近代为例, 在1947年的制定《大上海都市计划》过程中已明确提出“都市计划的大前提必须应用区域计划方法解决, 未有区域计划, 就不能有都市计划” (陆谦受, 1946), 足见区域观念已成为城市规划的重要前提。

在欧洲大陆, 国际现代主义建筑学会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Architecture Moderne, CIAM), 从1933年第四次会议 (雅典会议) 开始将城市规划作为现代主义运动的中心议题, 并明确提出了开展区域规划研究和实践的号召。纳粹德国也在区域规划的实践和理论发展方面取得较大进展, 致力于以区域规划为手段协调工业生产, 编制“四年计划”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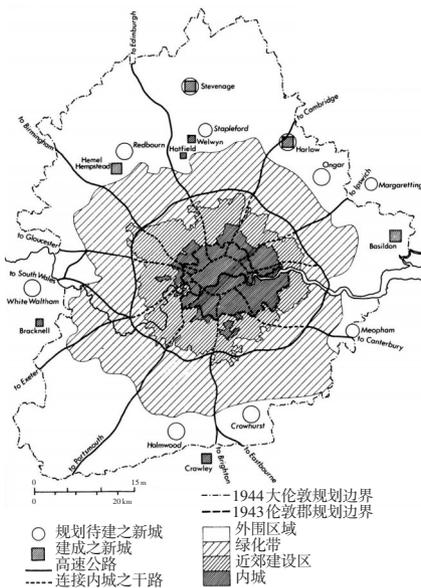


图 11 1944 年大伦敦规划的“四圈层”空间结构

Fig. 11 The four rings of the 1944 greater London plan

资料来源: Hall P, 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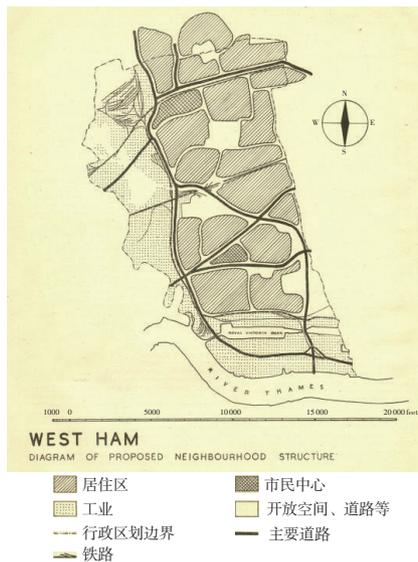


图 12 1944 年伦敦规划中邻里单位的典型应用, 1944 年

Fig. 12 Typical application of neighborhood unit theory in the 1944 Greater London Plan

资料来源: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UC Berkeley.

战争准备 (Pahl-Weber E, 2008)。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特勒 (Walter Chrsitaller, 1893—1969) 在 1933 年根据德国南部居民点分布的研究, 提出在较大范围内研究城市布局的“中心地理论”, 为此后经济地理、区域经济和城市规划等诸多领域提供了新的理论模型和分析工具。

## 5 余论

20 世纪上半叶席卷全球的田园城市运动主要由英国和美国推动, 这是规划史界普遍接受的观点 (Ward S, 2004)。不难发现, 这一时期区域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也主要是由英、美两国交替主导, 最终使“城市规划”突破了最早新建住宅区的狭窄范畴, 渐至涵盖城市的全部区域及其农村腹地, 并进而跨越人为设立的行政区划, 在更广大的“区域”范围内进行统筹布局, 跃升为落实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重要工具。城市规划“边界”扩大的经历, 反映出 20 世纪上半叶城市规划观念不断完善, 和现代城市规划学科于 20 世纪初诞生之后逐渐成熟的历史过程。

彼得·霍尔已注意到在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方面, “英美和大陆欧洲之间的差别始终是存在着的。但 1945 年以后, 这两条路线的相互掺合比以往多了起来” (霍尔, 2008)。20 世纪上半叶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区域规划, 相对而言普遍进展迟缓, 苏联和 1933 年以后的德国是其中的例外。通过前文可以看到, 在英、美规划家丰富区域规划理论、从事实践工作的过程中, 通过创立新机构、颁布新法案等措施, 区域规划在二战将近结束时得以制度化, 成为政府的职能之一, 也更易于在战后为其他国家所效仿, 为我们研究一种规划观念和规划制度的全球传播提供了典型例子。

可见, 区域规划思想的发展和演进与 20 世纪上半叶全球变局的大背景密不可分。英、美两国的经济政策都曾长期受自由主义思想统治, 在经济领域政府不作为而放任市场竞争。但至 19 世纪中后叶, 英国开始推行“市政社会主义”, 而美国则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进步主义运动, 节制资本扩张、加强政府干预, 成为牵涉政治、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改革浪潮。这一时期, “集权”国家苏联和德国的“计划”手段也显示出其效力, 西方传统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逐渐崩解。同时, 为应对经济危机和新的世界大战, 西方舆论逐渐倾向于将国家利益置于首要位置。因此, 英、美两国政府在 1930 年代以后改弦更张, 以政府职能的扩大

为基础推动了区域规划的实践。

但是, 英、美各自对区域规划的贡献和发展路径存在着显著区别。美国区域规划协会是民间学术团体, 其成员则以社会改革者自居, 他们不满足城市规划的常规技术手段, 而试图以区域规划实现城市空间格局的改造, 进而重塑美国政治和社会。美国区域规划协会主张的是去中心和多中心发展, 这与阿伯克隆比“在区域内各个城市不论其大小均能各安其所, 使区域规划惠泽广大而非一家独大”的观点十分相近。但这种理想主义色彩浓烈的构想受到以亚当斯的纽约市区域规划为代表的规划思想的挑战, 事实上也只有很少内容如居住点设计等被美国政府所采纳, 成为罗斯福“新政”的一部分。而英国的区域规划发展主要是由政府推动, 其方案制定后即成为政府政策的依据, 发挥了更大影响, 这一“由上而下”的发展路径也更易于世界其他国家所效仿。

## 注释

- ① 先后成立了公共保留地托事会 (Trustee of Public Reserves) 负责协同各地方政府制定政策如购买土地和优化空间布局, 及大城区公园委员会 (Metropolitan Park Commission) 负责处理具体的建设事宜。
- ② 其为曾在伯明翰市发起推动过“市政社会主义”的老张伯伦 (Joseph Chamberlain) 之子。
- ③ George Norris 是阿拉巴马州参议员, 深受进步主义思想影响, 主张加强政府职能, 其自 1920 年代开始推动《田纳西河流域法案》, 但屡遭当任总统否决, 至 1933 年始获通过。为纪念此人将第一座新城以其姓名命名。
- ④ 除下文讨论的巴罗委员会外, 又根据《巴罗报告》的对于土地问题的建议, 于 1942 年公布了《斯科特报告》(Scott Report), 1942 年公布《乌瑟沃特报告》(Report of the Uthwatt Committee), 从法理上研究为实现土地公有, 如何对地主进行补偿, 以及战后进行城市更新时将土地增值收归公有等问题。
- ⑤ 如新城规模受绿化带限制、与主城 (伦敦) 保持一定距离但交通便捷、在区域中形成新的城市格局等。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ABERCROMBIE P. Regional planning[J]. The Town Planning Review, 1923, 10(2):

- 109-118.
- [2] ABERCROMBIE P. The preservation of rural England[J]. The Town Planning Review, 1926, 12(1): 5-56.
- [3] ANDERSON L. Benton Mackaye: conservationist, planner and creator of the Appalachian Trail[M].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 [4] CHERRY G. 'The place of Neville Chamberlain in British town planning'[M]// CHERRY G E. Shaping an urban world. London: Mansell, 1980.
- [5] CREESE W. TVA's public planning: the vision, the reality[M]. Knoxville: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90.
- [6] CULLINGWORTH B, et al.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in the UK[M]. London: Routledge, 2015.
- [7] 崔功豪. 城市问题就是区域问题——中国城市规划区域观的确立和发展[J]. 城市规划学刊, 2010 (1): 24-28. (CUI Gonghao. Urban issue as the regional issue—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view of urban planning in China[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0 (1): 24-28.)
- [8] DALBEY M. Regional visionaries and metropolitan boosters[M].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2002.
- [9] GEDDES A. Regional planning and geography in the United States[M]. The Town Planning Review, 1938, 18(1): 41-47.
- [10] GEDDES P. Cities in evolution[M]. London: Williams & Norage, 1915.
- [11] GRAY A, JOHNSON D. The TVA region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M]. New York: Ashgate, 2005.
- [12] 彼得·霍尔. 城市和区域规划[M]. 第四版. 邹德慈, 李浩, 陈煜莎,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8. (HALL P. City and regional planning[M]. 4th edition. ZOU Deci, LI Hao, CHEN Mansha, translate.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Building Press, 2008.)
- [13] HALL P. The turbulent eighth decade: challenges to American city planning[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1989, 55(3): 275-282.
- [14] HALL P.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M]. London: Routledge, 2010.
- [15] HOUSTON S. T. V. A. : a study on policy formation[D]. Ames: The Dissertation for Doctor Degree of Iowa State University, 1942.
- [16] 胡序威. 一生无悔: 地理与规划研究[M]. 北京: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19. (HU Xuwei. An unregrettable life: studies on geography and planning[M]. Beijing: China Commerce and Trade Press, 2019.)
- [17] 胡序威. 国土规划与区域规划[J]. 经济地理, 1982(1): 3-8. (HU Xuwei. National land planning and regional planning[J]. Economic Geography, 1982(1): 3-8.)
- [18] JOHNSON D. Planning the great metropol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19] 刘亦师. “局外人”(二): 进步主义思潮与西方现代城市规划之形成及其早期发展[J]. 建筑史学刊, 2021(4): 147-158. (LIU Yishi. Outsiders(part II): progressivism and the emergence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modern city planning[J].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 2021(4): 147-158.)
- [20] 刘亦师. 带形城市规划思想及其全球传播、实践与影响[J]. 城市规划学刊, 2020(5): 109-118. (LIU Yishi. The planning idea of linear city and its global transmission and impacts[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20 (5): 109-118.)
- [21] 陆谦受. 大上海区域计划及土地使用述略[J]. 市政评论, 1946, 8(6): 11-12. (LU Qianshou. A brief account of greater Shanghai planning and land use[J]. Municipal Review, 1946, 8(6): 11-12.)
- [22] MACKAYE B. An Appalachian Trail: a project in regional planning[J].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1921, 19: 3-7.
- [23] NIXON E.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 conservation, ed[M]. New York: Hyde Park Press, 1957.
- [24] NOLEN J, HUBBARD H. Parkways and land value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 [25] ÖKESLI D. Hermann Jansen's planning principles and his urban legacy in Adana[J]. METU JFA, 2009(2): 45-67.
- [26] OLIVEIRA F. Green wedge urbanism[M]. London: Bloomsbury, 2017.
- [27] PAHL WEBER E. The planning system and planning terms in Germany: a glossary [M]. Hanover: Akademie für Raumforschung und Landesplanung, 2008.
- [28] 钱乘旦. 谈英国议会改革中和平变革的机制[J]. 历史教学, 2006(3): 5-11. (QIAN Chengdan. A discussion on the peaceful mechanism in British parliamentary reform [J]. History Teaching, 2006(3): 5-11.)
- [29] SAUSE G. Land development—value problems and the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 of 1947[D]. New York: The Dissertation for Doctor Degre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1952.
- [30] SCHAFFER D. The American garden city [M]// WARD S. The garden city. London: E & FN Spon, 1992.
- [31] SPANN E. Designing modern America: the reg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America and its members[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32] SPANN E.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and the reg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31 - 1936[J]. New York History, 1993, 74(2): 185-200.
- [33] The RIBA. Town planning conference (London, Oct 10-15, 1910)transactions [M]. London: RIBA, 1911.
- [34] The STAFF. The graphic regional plan(Vol I) [M]. New York: Regional Plan of New York and Its Environs, 1929.
- [35] THOMAS D. London's green belt[J]. Ekistics, 1964, 17(100): 177-181.
- [36] UNWIN R. Nothing gained by overcrowding[M].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reprint of 1912).
- [37] VAN ROOSMALEN P. London 1944: greater London plan[M]// EN BOSMA K, HELLINGA H. Mastering the city: North-European town planning 1900-2000. Amsterdam: EFL Publications, 1997.
- [38] WARD S. Planning and urban change[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4.
- [39] WENDELN M. Contested territory: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France, 1934-1968 [D]. New York: The Dissertation for Doctor Degree of New York University, 2011.
- [40] WHITE J. The 'dismemberment of London': Chamberlain, Abercrombie and the London plans of 1943 - 44[J]. The London Journal, 2019, 44(3): 206-226.
- [41] 吴超, 魏清泉. 新区域主义的发展观、方法论及其启示[J]. 城市规划汇刊, 2003(2): 89-93+96. (WU Chao, WEI Qingquan. The development view, methodology and enlightenment of new regionalism[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3(2): 89-93+96.)
- [42] 吴良镛. 良镛求索[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WU Liangyong. Liangyong's explorations[M].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16.)
- [43] 武廷海. 区域规划概论[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9. (WU Tinghai. A general survey of regional planning[M].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19.)
- [44] 吴万齐. 开创区域规划工作的新局面[J]. 建筑学报, 1983(5): 1-6. (WU Wanqi. Opening up the field of regional planning[J]. Architectural Journal, 1983(5): 1-6.)
- [45] 吴志强, 王伟. 新时期我国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展望[J]. 城市规划学刊, 2008(1): 23-29. (WU Zhiqiang, WANG Wei. A perspective review of Chinese city and regional planning in the new era[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8(1): 23-29.)
- [46] 杨达. 台纳西和乌拉尔是怎样创建起来的[J]. 科学时代, 1946(2): 11-13. (YANG Da. How Tennessee and Ural were built up [J]. Scientific Times, 1946(2): 11-13.)
- [47] 张之, 张学芹. 经济地理学与区域规划[J]. 地理学报, 1960(2): 129-134. (ZHANG Zhi, ZHANG Xueqin. Economic geography and regional planning[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60(2): 129-134.)